



冯白驹使用过的行军米袋。

一手拿枪一肩荷锄

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珍藏的马白山公文包。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

琼纵足迹·保障

A 革命菜是琼纵战士的救命菜

“我手里拿着的这株野菜就是革命菜，母瑞山作为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摇篮，红军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就是靠吃革命菜果腹，为继续革命保存了实力。”在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，已经85岁的老园长王学广已经记不清多少次，向来客讲述革命菜的故事。

他微微颤抖的手，举起一棵并不起眼的绿色植物——每次讲故事前，他都要到附近寻到这棵和红军有着不解之缘的革命菜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加具象地让来客感受到革命时期的艰辛。

事实的确如此。母瑞山山林茂密，草木丰盛，野菜采撷不尽，90多年前，红军隐藏在母瑞山上时，这一棵棵油绿的野菜，就是救命菜。

革命战争年代的海南岛，各方面物资非常缺乏，大部分时间里，琼纵战士都要面临缺衣少食的困难。

“琼崖革命之所以能够二十三年红旗不倒，是因为冯白驹带领战士们在母瑞山上挺过了最为艰难的8个月，保存了革命火种。”王学广说，1932年秋，藏身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琼崖红军，在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第二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伤亡惨重，仅余下100多人。这支单薄的队伍在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下，转入母瑞山，开始了8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。正是在这8个月时光里，红军克服了无数次缺衣少食的困难。

在敌军的封锁与袭击下，琼崖红军断了粮。为求生存，红军战士只能趁敌人未搜山之机，摸鱼虾、折竹笋、掏鸟窝、采野菜充饥。王学广说，当时的母瑞山，漫山遍野长着一种野菜，这野菜叶嫩茎软，几乎成了战士们每天的主食。“这就是被冯白驹将军命名的‘革命菜’。”王学广说。

B 以石头为床芭蕉叶为被

长期以没油没盐的野菜充饥，红军战士个个瘦得皮包骨头，不少人因此病倒了。但困难还不止这些。由于长期在密林中穿行，战士们身上的衣服早已被荆棘刺撕成一条一条的破布，衣不蔽体成了令人尴尬的大问题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，他们只能将树皮树叶用山藤连在一起，披在身上遮羞御寒。没有床和被，他们就睡石头床，盖芭蕉叶。

纵观整个琼纵历史，这样非常缺衣少食的生活还有多次：1929年伤员坚持战斗在六连岭，1943年三支队“小长征”，1946年挺进支队一大队一中队在六芹山活动……

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馆里，收藏着冯白驹贴身卫士的后人捐赠的行军米袋。

行军米袋是解放海南岛战役那段艰苦岁月的一道缩影。琼崖纵队老战士、原儋县政协副主席吴震海曾回忆，当时能征集到大米时是一日两顿饭，如果粮食不充裕，每顿饭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饭团；若粮食困难就吃稀饭，甚至“一碗粥两人吃”；若征集不到大米，就买番薯或者杂粮吃；若遇上敌人“围剿”，环境恶劣，就用野菜充饥。

条件好转时，红军战士也能吃上肉，但也仅仅是每餐饭每人一块肉，约一两大小。若部队准备打仗，参加突击队的指战员每人多加一块肉。有时后勤人员会想法买些海味，或到河里抓鱼；有时买不到蔬菜，只好煮盐汤下饭。

穿着方面，琼纵也一直没有统一的军服，直到1950年海南解放才统一发军服。由于部队常常买不到布匹，不能及时做衣服发给战士，大家的衣服都是参军时从家里带来的，时间长了，不少人的衣服是补丁之上再加补丁。

崖革命战士的绑腿布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

解放海南时，老百姓倒出新鲜的椰子水给过路的战士解渴。



解放战争时期，琼崖妇女支援前线。



上世纪60年代王国兴用过的量米木斗。

C 主动搞生产求发展

纵然缺衣少食，条件艰苦，但琼纵战士绝不会坐以待毙。在战斗之余，他们扛起锄头搞起生产，这是他们对抗敌人和饥饿最好的办法。

早在1928年初，琼崖苏维埃政府就在乐会县的赤土寮、定壮岭一带发动群众创办农场，共开垦200多亩荒地。到了1929年初，琼崖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失败后，在王文明的组织下，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很快就开展起了生产自救运动。

王学广说，当时没有生产工具，战士们就向附近的农民借；没有种子，他们就通过交通员发动苏区农民捐献。同时，随红军进入母瑞山的群众被安排在3个垦殖地区安居，即上村、中村、下村，通过垦殖维持生活。

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，至1929年夏，琼崖苏维埃政府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办起了3个农场，主要种植山栏稻、水稻、玉米、番薯、木薯、芋头、瓜菜等作物，还养了生猪和水牛，获得丰收的是番薯和山栏稻。“就这样，红军的生活得到改善，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顿干饭和一顿稀饭。”王学广说，红军农场解决了山上党政军民的

D 革命胜利离不开群众支持

革命的胜利，一直离不开群众的支持。

“最后一碗米，送去做军粮；最后一块布，送去做军装……”这首在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，是军民团结的生动体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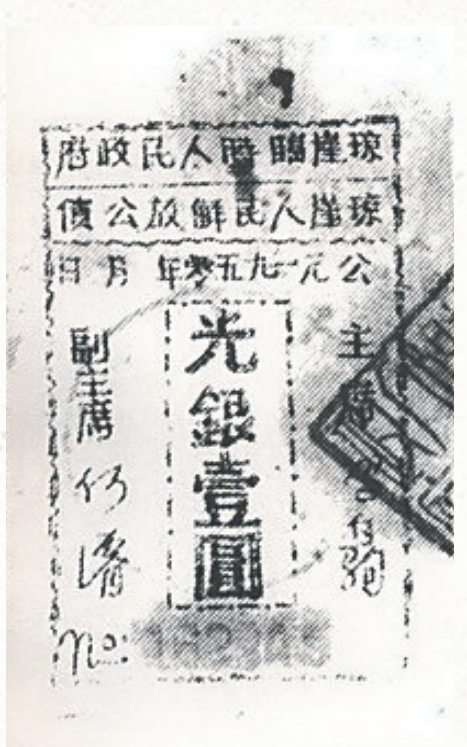
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，我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受到全琼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广泛拥护。在琼崖抗战时期，为了解决部队的财政开支问题，各地党组织开展临时性捐借活动，许多群众无私援助。1939年2月，日军的铁路踏上琼岛后，琼崖特委向全琼人民发出“人不分男女老幼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有钱出钱，有米出米，有力出力”的号召，海南岛掀起了为抗战捐献“一元”“一弹”“一升米”活动的热潮。仅1941年3月至1942年7月，全琼人民就捐献了数十万光洋、千余石米。与此同时，海外琼侨、港澳琼胞开展卖花、义演等活动，为琼崖部队募集经费。

1943年8月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与国民党顽军保六团在儋县四行村激战3天，最终保六团溃败而去，从此以木排为中心的多个根据地连成一片。时任临高办事处主任的符英华在其《澄临儋抗日政权工作的一些回忆》中写道，3天

生活供给，克服了敌人经济封锁的困难。

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的优良传统一直得到保持。抗战时党中央曾多次电示，琼崖要坚持抗战，不能寄希望于外援，也不能指望中央接济，要坚持自力更生。1940年，冯白驹在美合抗日根据地率指战员开荒种稻、种菜，养家畜家禽，鼓励农民开荒、扩种，帮助调剂种子，解决耕牛农具困难。收割季节，指战员一边保卫生产，一边帮助收割。各根据地还发动群众种棉织布。仅崖县梅山乡就发动6个村开荒种棉800多亩，解决了穿衣问题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各根据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开荒、发展农副业生产。中共琼崖区委在1947年发出《关于机关生产的决议》，要求“党政军各级干部及一切工作人员，均须自己动手，为生产工作而努力”；还要求各地广泛种棉织布，解决穿衣问题。由此，部队和机关的供应情况大为改观，有的达到菜、肉自给或半自给，有的自给有余。1948年，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获得空前大丰收，白（沙）保（亭）乐（东）三县基本不缺粮。



1950年2月，为迎接海南解放，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发行40万元解放公债。图为解放公债光银壹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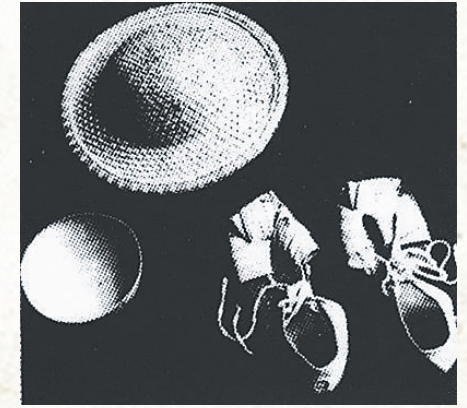


母瑞山红军农场遗址。



1928年的琼崖红军医院旧址（在今琼海市阳江镇岭脚村）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翻拍



独立总队战士用过的竹笠、椰壳碗和胶鞋。
潘启江 翻拍

自力更生渡难关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

1938年12月，琼崖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，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，琼崖国民党当局每月拨给独立队8000银元，作为饷薪和办公经费。

1939年3月，独立队扩编为独立总队，人数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，军费需求激增。而琼崖国民党当局推行反共政策，从1939年8月开始缩减独立总队的经费。从1940年1月起，琼崖国民党当局停发了独立总队的饷薪。琼崖特委为了解决独立总队的财经困难，于1939年冬在琼文革命根据地成立琼文经济委员会。琼文经委会每月收3000多元光洋，有时收5000多元光洋。

这一时期，琼崖抗日武装严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，“打没”的对象主要是汉奸、奸商和走私抗税分子。当时，琼崖有不少奸商以日伪为靠山，公然开展各种走私活动，运输物资资敌。比如，1943年8月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没收了陵水汉奸梁大同（日军情报员）和汉奸商人的一批财物和光洋1200多元。

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，我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受到全琼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广泛拥护。在琼崖抗战时期，为了解决部队的财政开支问题，各地党组织开展临时性捐借活动，许多群众无私援助。仅1941年3月至1942年7月，全琼人民捐献的现款就有数十万光洋、千余石米。与此同时，海外琼侨、港澳琼胞开展卖花、义演等活动，为琼崖部队募集经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抗战期间，香港琼胞募捐了20万元港币，新加坡琼侨募捐了30万元叻币，其他国家和地区琼侨琼胞也募捐了大量现金。琼侨琼胞还组建回乡服务团，携带大量物资回琼参加抗日。比如，香港的第一、第二批服务团带回的药品、器材、布匹、纸张共50多担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琼崖纵队的后勤保障逐步形成体系。1947年，琼崖纵队设立后勤部，各总队设有后勤处等机构负责筹措部队的军需给养。□